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九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六二期 ——  
（二〇一四年十月七日报出）

---

本期目录 （zk1410b）

【历史见证】	读扬子浪《文革日记》有感	华新民
【口述历史】	刘家驹作客共识网谈林彪与林彪事件	刘家驹
【百家争鸣】	逮捕“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生前部署吗？	章立凡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历史见证】

读扬子浪《文革日记》有感

• 华新民 •

谢定国（笔名扬子浪）是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作研究生时的校友。当年国门初开，刚到时校园里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人数不超过一打，都相互熟识。我跟他都是1962年从上海考到北京上大学，又是同一年进UCSD读书，经历相似，所以属于互相很谈得来的朋友，但是忙于学业，并没有深谈各自在中国的经历，后来毕业离校，就各奔东西，来往不多了，还有过短暂的联系中断。几年前他告诉我手上还保存着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日记，引起我的兴趣，觉得那将是有价值的史料，不过也没有指望他能将它公诸于众。毕竟，日记属于个人的隐私，文革中的日记，必定有许多今天的人看来可笑甚至可鄙的记载，是否公开只能出于本人完全自愿的决定，旁人是不能施加任何影响的，所以，后来这件事也就淡忘了。然而，几个月前他作了将其公开的决定并给我发来了日记的影印件，阅读之后，愈加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史料。

文革参加者即使曾写有日记的话，也难以保存到文革后。原因是文革中的个人或派别起起落落，几乎都有过整人和被人整的双重经历或者处于派别对立的状态中，抄家又是当时常见的“革命行动”，为了防范被对方抓到把柄，常常在危险来临前把日记等文字材料先行销毁。所以保存到文革后的日记，就像是地层里的生物化石一样，经历了地质年代的沧海桑田，只有在特殊的有利条件下才会保存下来。谢定国的日记，也是由于一些特定条件才得以保存到今天。这

里的有利条件，除了日记主人的历史责任感以外，还包括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的特殊状况。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一开始就直接控制了北大的运动——在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几天后，毛就给予了支持。在后来的工作组问题上，江青带领中央文革的人走在其他学校之前给北大的工作组定了调子，聂元梓也立刻紧跟。所以聂元梓为首的主流派在北京大学有相当强大的优势，谢定国恰好是这个主流派的一员，所以能相对安然地度过文革的最初几年，而没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也就没有销毁日记的恐慌心理。

文革日记能保存到今天，已经属于稀少，保存到今天而又愿意公诸于众的就更少了。这方面比较引人注意的有香港出版的原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和原北大哲学系学生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宋柏林、陈焕仁和谢定国都是文革期间的主流派——至少是最初几年——所以日记能够留存到今天。其中陈焕仁的日记同谢定国日记尤其相似，日记的主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个在哲学系，一个在数力系。都是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的活跃成员。陈焕仁的日记比较齐全，覆盖了他亲历北大文革的全部时间约46个月。它于2005年末出版，后来陆续有人指出其中存在整理过程中的改动痕迹，不免影响到它的可信度和对文革研究的价值。比较起来，谢定国日记没有那么齐全，只覆盖了66年8月到68年2月的19个月时间。这个时段之前的日记已经遗失，而在这个时段之后，由于日记主人“对文革的前景感到幻灭，又不敢在日记中记下任何怀疑和政治不正确的想法”，因而停笔。但是谢定国在整理这些日记的过程中，把改动限制到最小的程度。据我对整理后的文稿和影印的日记原文对照，只有与运动无涉的“大串联”中的一些游山玩水描述被略去，其余均保留日记原貌。

正由于文稿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真实性，阅读一篇篇日记，使笔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回到了当初“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例如1966年8月5日的日记中，主人对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有许多崇拜赞扬的话，他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江青的讲话：“感情炽烈”、“干脆利落不带任何折衷主义”、“有着千军万马的力量”。看到这些谀词笔者不免汗颜——不是替作者汗颜，而是为自己汗颜，因为笔者在1966年的下半年里也是中央文革的崇拜者。江青等人以前在报刊上不大露面，文革一出场就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记得看过一张传单，这样记载陈伯达在北大为那些受工作组迫害的人平反：当时一些激进的学生有一句口号“一切权力归左派”，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口号。陈伯达替学生平反时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上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怎么说“一切权力归左派”就是反动口号呢？在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中，法律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从来就是用来惩罚无权者的，属于林彪所说的那种“镇压之权”。而陈伯达在辩论中把宪法抬出来替民众辩护，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公平公正的印象，在当时真的有“千军万马的力量”，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下子就成了中央文革的拥趸。许多年后，杨小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及中央文革为了发动群众斗争“走资派”而打了一张“民主牌”。毛泽东一生大概只打过两次“民主牌”，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对付国民党，一次就是文革初期对付自己党内的同志。这张牌杀伤力巨大，也容易伤到自己，所以一旦达到目的，就立刻收回。被它鼓动起来的杨小凯们（包括谢定国和笔者）是付出了轻重不等的代价后才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受人利用。日记主人留下了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历史片断的真实记录，今天面对并公布这段历史不免令自己尴尬，需要足够的勇气。

这样的历史片断在谢定国日记有许多，也是日记的价值所在，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底层学生对日记覆盖的这段时间内历史事件的观察。其中有些片断也许不为别人注意，但是对笔者却有特别的意义。例如，日记生动记载了1967年4月5日清明节联动分子在八宝山举行活动后在颐和园遭到首都红代会的造反派红卫兵围剿的情景。这勾起了我脑海里早已尘封的关于一起“反标案”的记忆：我就读的中国科大校园与八宝山革命公墓相邻，就在那年清明这几天，学生食堂内发现了一张写有“反革命标语”的小字条，内容是支持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的要求，质问毛泽东敢不敢。当时多数人都认为这只能是知道中央内部斗争的老红卫兵干的——他

们到八宝山来向死去的前辈哭诉“江青阿姨”对他们的迫害之后，顺便到科大校园里发泄一点对毛的怨恨。这个案子后来不了了之，却让我校的一些同学受到怀疑和调查，影响了他们的毕业以至后来的人生道路。

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1967年2月27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毛主席在最近与张春桥同志的谈话中一再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反动的。”这段话让我又一次回到那个年代——我在1968年毕业分配的时候被军宣队和工宣队扣留了半年作检讨，检讨内容之一就是我在1966年的秋冬之际曾参与过一篇大字报的撰写，其中提出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人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大民主”口号的鼓励下，揭露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许多阴暗面。这些揭露一方面激起了群众对“走资派”的痛恨，另一方面也在学生中引发了一股“新思潮”，反思这些阴暗面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提出了“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其他一些口号。就像今天人们看到那么多大老虎被揭露之后，探索如何治本的对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这股思潮在学生中相当有市场。然而，“大民主”的这一后果，显然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所以不久之后，就被中央文革批判为“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甚至还在1966年12月抓捕了几个代表人物（伊林·涤西等）。这件事在文革洪流中或许只是一个小浪花，却波及到本人的毕业分配。近年回想此事，始终想不起“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良性”的意见为什么成了“反动思潮”？如此不讲理的定性源自何人？谢定国的日记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这个定性看来直接来自毛泽东——他深知“民主牌”会伤及自身的危险，密切注意它在青年学生中的反响，“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类口号的出现，或许是提醒他收回“民主牌”的信号之一，采取措施大约发生在1966年末。但是，打“民主牌”需要在报刊上大张旗鼓，收回它则宜以波澜不惊的“内部讲话”方式进行，所以毛的定性没有作为“最高指示”公布，而是先由中央文革抓人，再慢慢透露到社会上，两个月后传到北京大学。这样做，也像私下里撤销对“二十世纪北京公社”的鼓吹而改称“革命委员会”一样，使得毛泽东收回“民主牌”的过程不致过于突兀而引起“出尔反尔”的联想。

以上只是引起笔者个人兴趣的两个例子，事实上，谢定国的日记记载了更多人所共知的重大的事件以及他个人的评论，如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及姚登山、林杰以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垮台等等。还有一些记载是公众未必关注，但是对文革研究者有价值的内容，例如：1967年4月9日记载的“民族文化宫”抢档案事件，以及后来发展为北京高校“天”“地”两派间的斗争；7月2日的日记记载了“地院的几个兵团，公布了朱成昭及其同伙的反动言论的第一批材料，触目惊心。”此外，日记主人对文革时期北大校内外有影响的人物如聂元梓、郭罗基、牛辉林、孙蓬一、吴传启、蒯大富、韩爱晶等人的评论，对校内反对派“井冈山”和杨勋、樊立勤等人的讨伐，对乔兼武、“虎山行”、李洪山、伊林·涤西等人的批判，也会是研究者有兴趣的内容。

日记除了记载了文革中大小事件的所见所闻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它有大量篇幅纪录了个人所思所想，包括许多自我批评和真诚反省的内容。看得出来，当年的日记主人是个有进取心，但是又背着家庭出身包袱的青年，不愿意做“历史的庸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时常在在日记中解剖和激励自己，批评自己的犹豫和软弱。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判断是非的依据，或者用今天的说法，他的思想资源，这也是研究文革时期青少年学生心理有价值的资料。从日记来看，主人对毛泽东极为崇拜，称之为“使太阳都黯然失色的人物”和“握着历史缰绳的高超骑手”，对毛的著作、语录、诗词以及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内部讲话等等，都怀着崇高的敬意来学习领会，对反映毛泽东指导方针的文件如《五一六通知》、报刊文章如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及以中央文革为主的领导人的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也十分认真学习和紧跟。他当年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彪同志对毛泽东

思想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林彪同志及其他革命派的中央同志，才紧跟毛主席跨入了马列主义发展的三个大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而刘少奇呢则由停滞走向了彻底背叛。”毛泽东思想无疑是他思想资源中最基本的底色，这当然也是当时青少年的普遍思想状态。而这种思想状态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引导他们投入文革运动的一个条件。

这种思想状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成果。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里的灌输，以及日常接触到的报刊杂志、文艺演出，无不围绕着上述方针，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目标。这种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效果显著，在这本日记中褒贬的正、反面人物中可见一斑：日记主人引为学习榜样的有青年毛泽东、小说《红岩》里的英雄以及苏联女英雄古丽雅。他所厌恶的人物则包括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和“三十年代的吴晗”。《多余的话》当时正遭受猛烈的批判，瞿秋白也成为他鄙视的对象。日记也记载了对刘少奇及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这种批判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高潮，该文是1967年5月8日发表的，而日记主人走在了前面，早在1月3日就写了批判文章。可见，这种批判不是应景式的人云亦云，而是作者真诚信奉当时主流思想的体现。

卡玛的文献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主要采访文革时的中学生，突出了文艺作品如苏联流行的小说《牛虻》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对他们思想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日记主人的涉猎稍微广泛一点，阅读过的文艺作品除了中国小说《红旗谱》等，还读过当时被认为带有修正主义倾向的苏联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中国“反修”以后推介出版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看过的电影有供批判用的毒草《舞台姐妹》，还有《列宁在十月》和《誓言》、《波罗的海代表》等苏联电影。对于刚刚过去的“旧社会”，他的不少历史知识来自于当时的一些“内部读物”：阅读唐人的《金陵春梦》使他“获得大量历史资料，历史知识，得益匪浅”，阅读《西行漫记》让他“欣喜若狂”。从这张单子里，反映出日记主人的思想资源的单一和偏狭。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思想资源的偏狭，不是日记作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的问题。笔者和日记主人同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但进入学校已经是五十年代了，可以算是完整接受了新政权下主流教育的第一代人。比我们早出生的人，包括那些老共产党人，在家庭里和社会上接受中国旧传统的启蒙，如果上学的话，在按英美模式创办的学堂里多少接受过西式教育。而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前，社会氛围完全改变，学生喝的是高纯度“狼奶”——旧传统总是同“封建糟粕”相提并论，西方文明几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上虽然还没有完全禁绝，都被告知要警惕其中“毒素”。日记中提到英国首相艾登回忆录，评论是：“意思不大”。至于莫泊桑中短篇小说，虽然“有几篇相当奇异，有思想”，还是不忘批判其中“黄的，粉红色的，灰色的东西。”结果，日记主人当作“正能量”接受的外来文化，几乎全部来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到肖洛霍夫的苏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开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在政治外交领域以外，苏俄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资源的单一，或许可以解释，当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的时候以致到今天，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会如丧考妣。因为这些人——包括当年曾经的“反修战士”及其传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养分都是从苏联那条根里吸取的。从这意义上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的思想禁锢，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因为在本届和上届的中央领导核心里都有着日记主人的同龄人，从胡锦涛、温家宝、俞正声到刘延东当年也曾是在同样的校园里接受同样教育的大学生，当然也不必讳言，这个群体还包括近年被揭露的“老虎”慕绥新、郑筱萸、李纪周、李嘉廷、陈良宇、周永康和徐才厚等，这些领导人——不管日后的经历和下场如何——假如当年写日记的话，其中的思想、语言不会同这本日记有大的差异。所以扬子浪的日记对于当代政治研究者也有某种参考作用。

当然，谢定国也像其他青年一样，随着文革的展开，经历过林彪出逃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以及文革后的种种变化，有许多新的认识和反思，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出国后有了新的国际视野，接触到了多元的思想资源。笔者从和他的接触中感受到他是一个敏于观察和勤于思考的人。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校园里有五花八门的学生团体和课余的集会，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团体在校园里举行活动，反对南非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抗议里根政府对南非政府的姑息态度，在校园里开展“撤资运动”(disinvestment)，呼吁美国的企业抵制南非政府，撤回在南非的投资。谢定国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至今还记得的话：“美国学生的觉悟比我们高！”我们是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我完全理解这句话的背后含义：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参加过多次天安门集会游行：抗美援朝、声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等等，每次都是义正辞严、声势浩大，但是全都是上边统一领导、统一布置的。而像美国的学生那样自发组织起来，从事他们认定为正义的活动，我们一次也没有做过。笔者相信，正是这种对事物的观察和思索，使得谢定国能够摆脱过去年代里被灌输的那些思想资源的桎梏，以全新的视角面对过去，以古稀之年的达观和淡定将自己弱冠之年写的日记公诸于众，留作历史的见证，完成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使命。

2014年9月20日

~~~~~  
【口述历史】

刘家驹作客共识网谈林彪与林彪事件

• 刘家驹 •

共识网编者按：9月12日，共识网邀请《解放军文艺》资深编辑，《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刘家驹老师作客共识演播厅，讲解林彪与“九一三”之谜。刘老师出生于1931年，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曾奉命撰写《林彪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林彪传》最终搁浅。在撰写《林彪传》的过程中，刘老师接触了林彪身边大量的工作人员以及部下，通过对他们的走访，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口述历史材料。

“九一三”事件过去43年了，但是当中的谜团仍然没有澄清，刘家驹老师这篇文章也许可以部分还原林彪其人以及“九一三”事件原貌。正文内容已经刘家驹老师审订。

主持人：刘老师，我想知道您对林彪的评价，您说他是军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蠢材，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

刘家驹：我先说几句开场白，共识网邀请我来谈“九·一三”事件，我很感动，你们有胆有识，敢于在今天来讲林彪的问题，这在我们国家当前来说是件难事，但你们做的非常好，没有顾虑。

我患有心脏病，搭了四个支架，今年三次心梗，一次脑梗。你们要我谈“九一三”，我很兴奋，应该来面对，再不谈，我采集的一些资料和半条命就没有了。

主持人：谢谢刘老师。

刘家驹：今天这个时间正是43年前“九·一三事件”的始发时间。当年的此时此刻，毛泽东刚回到丰台就召集李德生、吴德、纪登奎、吴忠汇报，还部署李德生在南口放一个师，说明毛泽东有所警觉。毛泽东回到北京，打乱了林立果小舰队的部署。他们在北京开了几天会，慌忙散伙了，准备跑。今天你们选这个日子，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思，应该是件好事情。

## ◇ 平型关之战吹牛太大

刘家驹：言归正传，最好纵深地讲林彪。林彪参加革命很早，17岁就入团，19岁入党进黄埔军校。南昌起义的时候是连长，上井冈山到1932年，已经是军团长了。林彪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战争培育了他非常难得的军事才干。两万五千里他是开路先锋。过湘江，我军伤亡过半，周恩来要负全责，他指挥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是把坛坛罐罐都带上的“大搬家”。林彪在湘江西岸打开了个大口子，由于后续部队行动迟缓，林彪守不住撤走了。结果红军八万多人死拼硬打的过了湘江，剩下不到四万。

四渡赤水，毛泽东乱指挥，林彪打了两个败仗，比如土城、青杠坡的两次战斗，一军团损失五千多人。但林彪在保卫遵义之战中，打败了吴奇伟。

抗日战争，他指挥的平型关战役，这场战斗的胜利在当时国内影响很大，报刊吹牛也大，说歼灭敌人三千多啊，两千多啊，最后说有一千四，这些数据都不准确。林彪身边的作战参谋苏静告诉我，他清点了战场，真正歼灭敌人只有八百多人，跑了六百多。日军是一个辎重大队，总共只有一千四百多人，我们怎么说歼灭两千多人呢？但是，这个功劳在当年还是了不得，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挺高了我军的抗日士气。

平型关之战，我军装备太差，打起来火力轻，一支枪才十几发子弹，拼刺刀三个人对一个日本人，敌人退到一座高山上守住老爷庙顽抗，我们拼命攻山，伤亡2800多人，林彪看到伤亡的大多是红军战士，还大哭了一场。

林彪的负伤是1938年3月2号，中央命令他到吕梁山建立根据地，路过隰县，行军的时候他跟着前哨部队走，一共15个人，15匹马，林彪穿了一件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阎锡山部队的哨兵班长以为是日本人来了，就专打穿日军大衣的。

参谋给他包扎，并报告中央。送负伤的林彪过黄河的时候昏迷了，林彪命大，到了延安，半条命救回来了，又送到苏联治疗。回国以后，当了三年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又重新率领部队打解放战争。

林彪最突出的战功是东北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有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向北发展到哪里呢？东北。东北是个工业基地，又靠着苏联，是个非常好的夺取全国胜利的起点。林彪受命去了东北，一到山海关，看到集结的都是些杂牌部队，冀东过去的部队很少，黄克诚带他的三师三万多人算是主力，整个部队集中在一起才9万5千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内部也不团结。又是冬天，部队处在“七无”的困境：——无地方的党组织、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有些主力部队还缺枪少弹，雪地行军，冻死、饿死了很多人。还被国民党追过了松花江。林彪在艰难困苦中，坚决执行了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把从延安来的两千干部撒向基层开辟根据地。他边战斗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凡是俘虏的日本军人的技术力量，他都充分的使用。如医务人员、枪炮修理、飞机驾驶、汽车驾驶、火炮操作，铁路管理等，迅速提高了部队的素质，部队很快得到发展。

辽沈战役一结束，林彪的部队壮大到130万人。当时我们四个野战军的军力都无法和林彪的四野相比。一野只有7万5，二野从大别山出来是12万5，华野好一些，38万人。林彪的130万人又有优良装备，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 ◇ 林彪的军事理论，在世界军事将领中少有

刘家驹：林彪的军事理论在世界军事将领中是很少有的。很多著名的元帅和将军，都把自己的军事思想放在战略运用上。林彪却把他从战争获取的经验重点放在单兵、小组、班排连的基层战术的运用。他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非常实用。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我觉得用他的方法为战争需要做准备训练部队是非常实用的。国外的一些军事院校都采用了他的战术做教材，林彪堪称世界级的将领。

建国以后的林彪一直在养病。医生告诉他要像候鸟一样南北转游。国家大事他也关心，高饶事件没有介入；反教条他避开了；庐山会议避不开，跟大家一起把彭德怀骂了一顿。后来他主持了军委，提倡“四个第一”、“四好”、“五好”，部队开展学毛泽东著作，一切以毛泽东思想为建军的根本就是 he 抓的。在历史条件下，他对巩固军队，这还是有作用的。

#### ◇ 林彪对出山早有先见之明

主持人：文革中的林彪是什么样的呢？

刘家驹：林彪是怎么介入文革的呢？1966年的7月，周恩来两次到大连，一次是陪外国代表团，一次是专门传达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主要是那封信。周恩来告诉林彪原信烧了，现在是根据原来信的意思重新写的，又经过毛主席的审定，周把信传给了林彪。信中间有对林彪的批评，主要是对他“五·一八”讲话中谈政变的问题。林彪听了周恩来的传达，心情沉重。周围的工作人员观察他那些天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开十一中全会拒绝去。直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周恩来打来电话，他才不得不在8月6号回到北京。回到北京那天是周恩来去接机的，周单独的跟他谈话，说了什么，谁都不知道内容，最后周恩来跟他说“最好先见见主席。”

林彪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见毛就跪下了，就是军人的那种一只腿的下跪。毛生气的问他：你是不是想学明世宗？这句话以及林彪的下跪是不是真实的，我考查了很久。后来党校的一位研究员，他从档案馆看到了李文普的交代中间有这个说法，研究员就向我提出问题：毛说林想当林世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说，那不是林世宗，是明世宗，嘉靖嘛。我这才相信林下跪是真的，是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在现场看到的。当时他跟叶群作了汇报，叶群不让外传。

林彪是拗不过毛泽东的，最终勉强接受了出山。

林彪是个自恃很高的人，他给毛的下跪历史会记住的，从此刻起，林的后半生命运就彻底地交给毛泽东了。

#### ◇ “八·一八”讲话不是林彪的真实意思

刘家驹：八届十一中全会选林彪当了唯一的副主席，这里有个小故事。毛泽东虽没有提名，陈伯达心领神会的玩了个小花招，他也要表明不是自己的提名，他把周恩来、康生，陶铸找在一起，陶当时还不是常委。陈伯达说，少奇同志已经不行了，下一个接班人选谁？我们在自己的手心上写个姓，互相对一下。结果这四个人都写了林。这个传言来自邱会作，我是相信的。

林彪选为二号人物后，他在全会上的一番讲话是很耐人寻味的：“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他的话是出于本心的。

8月18日林就上天安门发表讲话，“八·一八”是个什么样的讲话呢？是一篇文革的宣言书。号召红卫“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要他们去“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

长期养病的林彪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我问林彪身边的秘书张云生：“林彪刚出山，对毛发动的文革知之不多，讲这段话的内容是你们哪个秘书起草的？”张回答：“我那时刚到毛家湾，我也不明白，还是老秘书阳地告诉我，说，中央文革有规定，今后凡首长的讲稿都由中央文革审定，首长的命令、指示都要送中央文革梳理。首长要接见外宾，对群众团体的说话要点，都要报经毛主席批准。”张又问阳地，那么“八·一八”讲话是中央文革起草的吗？阳地回答：“是伯达同志亲自捉笔，写成后报给主席审定的，主席秘书告诉我，主席还做过不少的改动。”

“八·一八”讲话以后，9月13号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毛让林彪在会上讲话，公开点了刘邓的名，责成他俩对派工作组一事作出检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来的都是各省市的头头脑脑，百把人，批判刘邓对他们来说难以启口。毛火了，把全国的造反派头头找来几百人，京西宾馆给挤的满满的，整整把刘邓批了十天。林彪在现场，他没有感受吗？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吗？

#### ◇ 叶群是毛家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刘家驹：10月1号，中央领导都上了天安门。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陶铸的女儿陶斯亮都跟着，林彪在前面宣读中央文革起草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讲稿，几个孩子在后面议论。李讷是毛泽东了解在京院校的联络员，陶斯亮是上海军医学校造反派的头头，她俩都指责军队保守，按兵不动，在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说有不少部队支持保守组织，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李纳放言，如长此下去，主席要解散军队。

豆豆回来后就向叶群报告，叶群紧张了，赶紧把林彪叫来，让豆豆把天安门听来的话传给了林。林彪一听，也焦虑地说，如果我们再不采取办法，就要犯错误了。他马上让秘书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志坚、刘华清、萧华都找来了，商讨办法。军队能动吗？军队乱了怎么办？叶剑英提出了个折衷建议，这样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以下的部队不动，让军队院校搞些串联。林彪赞同，很快起草了一个紧急指示。由叶剑英于10月5日，在工人体育场当着北京的师生、各地的造反派宣读。

林彪当时对待文革的态度确实是被动的。我有采访林办秘书的记录：从这一年的十月以后，掀起文革的热浪席卷全国，军队上下却是一片骂声。多年养病的林彪，胸中还没有社会这一扇窗口，他只是在观察，在判断，看主席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走向。这段时间，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经常向他来汇报，他只是听、问，但不表态。叶群还规定我不得跟林彪说社会和部队的乱象。传来了小道消息，也只能告诉她，不能告诉林彪。

这时的叶群，是毛家湾最有权力的人，也是最忙的人。她要参加御前会议，奔波钓鱼台，协调中央文革小组议政。军委开会，她要代表林彪表态。各军兵种的大事、小事，都要由她躬亲，汪东兴找他、总理找他，各大区领导工作请示也找她。造反派来京告状，她要上人大会上接见。她房间有三部电话，甚至端着饭盒子，边吃边和人家通话。

这就是林彪在1966年10月前后所处的真实状态。

#### ◇ 林彪根本不想部队乱



刘家驹：这时候的毛泽东不单鼓动地方造反，还号召军队机关“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时间，各军兵种、三大总部机关和一百多所军事院校“群情奋起”，老革命纷纷被打倒，主官被批斗，有的甚至四处避难，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就逃到大别山。全军除林彪外，老师老将几乎无一不被整肃，连被视为林彪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也被整的死去活来。

广大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愤怒了，他们暗中支持保守派，认为保守派出身好、党员多，于是斗争升级了。开始的武斗，都是拳头、棍棒相向，后来各军分区人武部都给造反派放开手，让他们到军事仓库抢枪，全国动用热兵器造成的流血事件天天报向林办，林彪都向主席报告，比如说，有一份说西北情况甚堪忧虑，林彪斟酌“忧虑”这两字有些不妥，把“忧虑”改成了“注意”。林彪那时候真是谨小慎微。

那个时候部队常有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发生，而且互有伤亡。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给他的一份简报上批示：

这是个大好事，左派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林彪看了无所适从，他不想让部队乱，只能阳奉阴违。因经常给毛看这类流血的报告，毛逐渐的对林彪有了看法，后来毛见了安徽省军区的一份军队阻止造反派冲击省军区的报告，发火了，说军队不介入是假的，让林彪收回“紧急指示”，重新发布新的八条命令。

八条命令下达后，280万军队全投入“三支两军”（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明确必须支持造反派，不得镇压。

从1967春开始，机关，学校，公社，工厂，企业，交通……军人无处不在，国家进入了军人专政时期。

◇ 吹捧文革是林彪当年之“得”，今天之“失”

刘家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紧跟”毛泽东，始终是在拨慢步。他巴望文革早结束。

1968年10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是为1969年召开九大做准备的。目的是要确定党的政治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当时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40人，八大选举的是多少？97人，现在出席的人只占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几。那些人到哪里去了？10人过世了，其他的被打倒了。就这么个状况，毛泽东还要组织批判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些人是“二月逆流”的主将，毛要跟他们算账，要清理他们的思想。还要背靠背的批判老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剩下的人都是忧心忡忡，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大难临头，林彪何尝没有想法？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特别，他既不跟毛反“右倾”，也不批“二月逆流”，他讲的是世界文艺的三大复兴，奴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这篇发言引起江青的愤怒。江青觉得，讲文艺只有她才有主导发言权，怎么是林彪来讲？

我认为当时林彪讲这篇话有他的出发点，他对“二月逆流”是同情的，不能再去落井下石。朱德这些“老右”，也不能批。但毛又要他表态，怎么办呢？他就抓住这个题目，大谈世界的文艺复兴。借机把毛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第三浪潮的顶峰，让毛满意，又向江青挑了战，老将老帅也不会责怪他。

在历史条件下，林彪的这一做法是聪明的，但今天来看，我说他很愚蠢。今天人们重新审视的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那是意识形态的极端，是暴民政治，是反人类的。林彪把它举到天上，这就是林彪当年的得，今天的失。

这些代不代表林彪的真心呢？不代表。为什么这么说？十二中全会完了，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有一天散步，他突然跟陪同的张云生说，我做了幅对联，你听听。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同登彼岸”。下联：“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这就是林彪最真实的思想，他看到了文革的后患，但只能隐藏在心里，对他的孩子和夫人都没透露，哪怕对最信任的人也只透露了这一点。这就是林彪襟怀的多面性。

#### ◇ 林彪不是一个钻营的人

刘家驹：召开九大要修改党章，1969年的2月初，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草案。其他政治局的成员都在“草案”上划了圈，“草案”送到毛家湾，等林彪划了圈就送给毛泽东划圈了。林彪看了“草案”，用红铅笔划了个大圈，勾掉了要他当接班人和赞语的一段话，林是有意用这种不恭敬的方式给毛明迹坦心的。叶群紧张了，要管文件的李根清用消字灵消去林划的红圈。林知道了，找来李根林拍着桌子骂他，李根清难受了好些天。

我这里还有个记载，当时宣传毛主席是万寿无疆，林彪是永远健康。林彪让工作人员印了三千张传单在一些会议上散发，不能说他是永远健康，更不能让他跟毛主席平起平坐。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毛泽东组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共同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张姚谦让，陈只好自己动手。陈征求林彪的意见，林彪说最好把毛当年八大的讲话《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写进去。写进去的是些什么话呢？就是“当前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林虽然心中没有多大的社会窗口，他能看到暴风骤雨的文革中，国民经济已经处在崩溃状态，为了国计民生，该抓革命、促生产了。陈伯达很快动笔写完后报给毛，毛连文稿的封都未拆就退给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趁机批判陈，说陈写的政治报告是唯生产力论，充满修正主义的货色。这是林被选为副主席以后，毛给他的当头一棒。这一棒，林沉闷了好多天。

#### ◇ 庐山会议存在两个误判

主持人：林彪跟毛的关系在1970年出现了极大的转弯，这是为什么？

刘家驹：林彪和毛的关系，最关键的就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可以说庐山会议是“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线。

为什么说它是“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线呢？我讲讲庐山会议很多人不知道的前因。最初是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人大召开前，要先开九届二中全会，比如修改宪法、经济问题、战备问题，这些都要在党的会议上先议定。这里面有两个误判，上海帮误判，毛家湾误判。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上海帮在1970年春天，具体时间我搞不清了，在上海召开了经济工作座谈会，有上海的知名人士参加，其中最著名的是陈望道。他们的讨论中，把张春桥捧得特别高，认为张春桥抓上海工作贯彻毛主的革命路线坚定不移，组织能力、政治能力非常强，又年青，意思就是张春桥进入中央接班总理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写了约千把字的简报，很快送到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嗅觉很灵敏，感到上海帮在抢班夺权了。汪东兴是靠林彪这边的，简报没敢直接给叶群而是给了陈伯达，让陈伯达当二传手。陈伯达一看，马上写了

条子，请叶主任看。叶群一看，哟，上海帮要张春桥顶周恩来的班了。因为毛当时对“小张”很感兴趣，这就引起叶群的猜测，要是把总理赶走，让张春桥上来，那将来军队怎么办？叶群跟陈伯达商量，召开了半个政治局会议，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黄吴李邱等等大概十个人参加，讨论上海的这个简报。大家认为上海帮意图不轨，要制止。怎么办呢？陈伯达提出要清君侧，必须抓住张春桥的反天才观批判。叶群一听，好，我们马上做准备。然后就由叶群主导，组成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给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准备发难的讲话稿。空军党委、空军政治部，林彪身边的几个知名人士，如邢贲思、杨尚奎，还有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都参加了。一共有30多人。林的讲话列出若干小题分到个人执笔，叶取名叫“拉条子”。林立果也自告奋勇的写了一段“富国强军”。半年的时间都在为庐山会议做准备。

庐山会议召开，林立果最积极，他要上山，找到汪东兴，汪东兴说好，你坐我的飞机，林立果说还要带周宇驰。汪东兴说，行啊。林立果和周宇驰上了庐山。那时他们觉得这次上山就是“倒张”，没有动江青，目的是“清君侧”，势在必得。现在有学者不认同是“清君侧”，我认为，林彪没有夺取大位的企图，只是想将张春桥扳倒，削弱四人帮的力量，让毛泽东多听听军队的话，赶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到会有中央委员200人，候补委员55人。这里要说明，军队的比例很大，能达到62.2%。

林彪报告之前，先是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小会，康生、张春桥、林彪都参加了。毛先问张春桥讲不讲，张说不讲，林彪说我准备讲。康生说我可以补充。后来张春桥走开了，康生也走开了，林彪就把自己的手稿给了主席看。意思就是告诉主席我准备要讲几个问题。毛不看，跟他说，你可以讲，不要点名。没有说更多。林彪就甩开了手稿讲，讲了约一个半小时，现在看林的讲话全文，虽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确实遵照了毛不点名的要求，讲的非常谨慎。

林彪在“不点名”的讲话中只说了几句：“……毛主席写了几十年的东西，水平高，有创造性，说他没有发展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列主义的。因那个中央不同……”后来康生又讲了20多分钟，支持肯定林讲毛泽东的天才观。到会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听懂林彪说的“因那个中央的不同”指的是谁？是什么意思？因此在讨论的时候，也没有人对张春桥进行批判，叶群着急了，赶紧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空军的一些人找来点火，让他们宣扬“那个中央的不同”的含意，说，你们不要直接点张春桥，点陆定一式的人物就行了。周恩来还让吴法宪带着录音机播放林彪的讲话。那个时候参加庐山会议的军人多，他们对张春桥反感透了，批判开始后庐山像一下着了火，掀起了要把张春桥拉出来批倒、批臭的阵势。

◇ 林彪知道下一个是自己了

刘家驹：这时候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告御状了，说批张就是批文革，有人在搞非组织活动。陈伯达在会上搞了个八条马恩列斯语录就是罪证。毛看到整个军队的代表都倒向林，而且对张春桥的批判就是对着他来的，毛不干了。25号下午，毛召开大组长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有陈伯达和汪东兴讲话的六号简报。毛这么一搞，老兵都偃旗息鼓了。31号，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我的一点意见》其实是两个稿子，这是后来我从江青1972年有个讲话中发现的。第一个稿子点了林彪的名，第二个稿子把林彪名字拿掉了，改成了“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中间有一段话保留了。毛骂陈伯达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你跑到哪儿去了？意思就是陈伯达在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时候跑到彭德怀那儿去了，当时彭德怀上了万言书，第一个交给的人就是陈伯达，陈伯达再交给毛。当晚，陈伯达就跑到彭德怀那儿去了，说写得好好，我支持，我赞成。这些话都传到毛的耳朵里去了。毛对陈伯达结下了梁子。《我的一点意见》说陈伯达到处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这不是陈伯达干的嘛，明明是林彪讲

话造成的嘛，林彪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打陈伯达就是打他。后来，周恩来、康生，来回做工作，让林彪去见一见毛，林彪不见。9月6号下山，林彪连向主席告别都没有就走了。林彪气啊，他认为，是你主席同意让我讲的，我没有点名嘛，为什么还打我一耙？林一下山就“窝”到了北戴河。

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大都给毛说成上了贼船的。毛要“宜将剩勇追穷寇”，陈伯达给软禁了。还给吴法宪、叶群开了三次批斗会。林彪知道，下一个就是他了。

1971年的5·1晚上，按照惯例，国家主要领导人要上天安门观看焰火。周恩来打林彪电话要林参加。林彪去了，给毛敬了个礼。关于这个场景，我也有记录，是采访叶群身边的内勤小毕录下的：城楼面向广场的平台上布满了圆桌，不少人已入座，主席坐中间一桌，他正兴致勃勃的和西哈努克夫妇攀谈，林走到他面前敬了礼，毛抬起头，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叶群上去紧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了句什么，主席用手指点了点叶群，叶群笑了，很激动。林站在一边没说话，走开了，到了离主席好几个位置坐下来，他侧着身纹丝不动望着广场。大概不到个把小时，林突然起身离座，向我和李文普站立的地方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如厕。他到了我跟前，一挥手说，走，回去。我愣住了，焰火满天飞舞，主席还没有离位，不辞而别好吗？小毕还用理性的口气惋惜说，他俩又拉开了距离，四个月后的9·13分道扬镳了。毛是自己孤立了自己，林是赌气走向了他人生的终点。领导人的矛盾激化就是流血。

#### ◇ 林给毛写的“四不一要”是他最心里的东西

刘家驹：到了5月20号，林彪给主席写信了。我问他的政治秘书于运深，于告诉我，“这封信的内容让人吃惊。林给毛写信提出‘四不一要’，林口述，我记录。主要内容有，暂定在十年内，对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和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这是‘四不’。遇有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密指示。这是‘一要’。并且要求将这‘四不一要’传达给每个士兵，十年不懈。我记录后，由叶群整理，我看了整理稿，没有增添内容，只是细化了文字，林和总理通了话，由保密员李根清抄成了三份，一份留底，一份给了叶群，一份送了总理。”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的权力无人可比，任何人他都可以打倒。我记得十多年前，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采访我，让我讲讲对毛的评价。我说了一句话，在中国历代611个帝王中间，毛泽东是最独裁的。林写这封信虽是在忠告毛泽东对党政军的一把手不要輕易抓、杀、关，实际上是对毛独裁的大揭露。

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态？他的意思是，即使我见不到主席你，也要用最忠诚的话劝戒你。这是林彪从心底发出的最后呼声。

#### ◇ 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的计划

主持人：关于九·一三事件争议很多，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刘家驹：要知道九·一三，就要把时间放到“九·一二”。九·一二那天林彪在干什么？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无法知道林的内心世界。可以知到的是，上下午他在审查干部名单，还提到尼克松访华的问题，傍晚参加了女儿林豆豆的婚礼。从现场的人分析的情况来看，“九·一二”那天，林彪没有任何要跑的迹象。算他经历了千军万马的斗争，也不至于心情平静到这样一个程度吧？我认为林彪对儿子林立果的策划是不知情的。

至于林彪对“九·一三”承担多少责任，我不赞同中央的说法。中央认为，他跟着跑就是犯罪，跑了就是事实。现在的法律还有无罪推定，而那个时候是政治决定一切。

#### ◇ 小舰队真正的成员只有三个半

刘家驹：我先告诉你一个数字，1981年审判“两案”，有很多东西没有公布。涉案的人员是多少呢？120674人，其中省军级862人，地师级3699人，县团级11668人。这个数字高得惊人。后来我从大量的资料，包括对李德生的采访中了解到，真正涉案的人没有这样高的数字，毛泽东讲涉案人员百把人吧，李德生说几十个人，李震说十几个人，李震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但是我要认定，小舰队的真正成员只有三个半。哪三个半？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驰，王飞算半个。下面我就告诉你，这几个人的状态。

现在很多人没听过王飞的名字，王飞是空军党办的主任，后来当了空军副参谋长。叶群曾经把林立果交给王飞，让王飞管。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把王飞的位置放的很高，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之后就是王飞。后来把他拉下来了，换成了江腾蛟。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王飞的地位。

王飞是个“三八”式老兵，抗日战争的后期已是渤海军分区独立团的政委了。进城后，他被选到空军司令部当了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处世练达沉稳，叶群到太仓搞“四清”，特地带上他当助手。林立果进空军后，所有活动都是王飞在安排，王还管小舰队那帮人。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有个空军的女文工团员从毛那里得到信息传给了他，说毛对“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庐山会议还在耿耿于怀，说了句：雨过未天晴。王飞闻到形势不对，就急着后退，从此，他对小舰队的活动多是应付，所以我说他只能算是半个。

小舰队成立之初，目标是反吴法宪的。林立果认定吴法宪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就是说他对周恩来、江青、叶群一样的热情。对周好，不会引起责难，对江青过分亲密却是大忌。这是小舰队反吴的基因。林立果还准备把王飞举到司令的位置，让吴法宪靠边休息。小舰队反毛是庐山会议之后的事。

林立果是1967年到空军的，这年他还不满22岁。在基层摸爬滚打一个月就调到空军机关当秘书。他很聪明，不愿意在机关，经常主动下部队搞调研，他从情报部门弄来不少机密材料，写出“保密与泄密”的研究文章，还搞出很多小发明。比如汽车怎么在沙漠上行动，飞机机械故障报警器等。林立果还搞了几个大工程，比如说，无人飞机。我们国家是没有无人机的，他和周宇驰弄到架打下的u2无人飞机残体，拿到沈阳飞机厂让工程技术人员仿制，搞出的无人飞机可以在天上飞个把小时，高度能到1200米。他们还把林彪叶群邀到南苑机场观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林彪看到后很高兴。1970年，雷达部长研制出541型远程雷达，林立果策划到内蒙选了座黄羊山组织施工，劈山半拉，把雷达安放在山腰上对向莫斯科。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林立果兴致勃勃上了庐山，看到的结果却是一场败象，回到北京愤然骂他娘，说叶老胖瞎指挥给翻了船；指责黄吴李邱搞不到点子上；周恩来看风使舵…1971年3月，他带领周宇驰、于新野到上海写成《571工程纪要》准备搞政变。

周宇驰是1945年入伍的，他是一航校宣传科长任上调来空军司令部给刘亚楼司令当秘书的。这人个性坚强，人品正直，敢当面顶撞刘亚楼。1960年代初，空军训练每年要摔飞机几十架，刘亚楼经常把空军摔飞机的事瞒下来，但周宇驰就敢把各种事故报给军委，周宇驰指责刘司令：用黄金等身培养出来的飞行员，摔飞机死了，不报就是犯罪！刘亚楼可是一霸啊，一气之下把他打发到某工程团当政委去了。刘亚楼去世后，爱才的王飞才把他调了回来。

自林立果到空军后，扶持林立果成了周宇驰的专职。他俩形影不离，情同手足，还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林立果在他的呵护下得到快速的成长。为了宣传林立果，周费心尽力修改林立果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给林立果组织了学毛著的《讲用报告》，让林立果大讲空军的建设。

1970年的8·1，在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四好五好代表会议上，林立果讲了八个小时，因此这个报告也被叫做八小时报告。报告引起轰动，赞扬林立果是小天才、超天才，给他的讲话印了48个版本，共计714265册，空军人手一册。

再一个于是新野。1947年的兵，叶群在太仓蹲点时，凡是给毛泽东的报告都是他写的，叶特别看重于的文笔简练犀利。于新野原是轰炸36师的宣传干事，他父亲早年是我们党苏北地区涟水县的县委书记，解放以后当了上海电台第二台的台长，建国初因统购统销犯了错误，弄到宁夏电视台当副台长。于新野对党没有任何的怨言。为什么突然间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他有一个情人是空军文工团的演员，非常漂亮，女演员爱上他，但他是个有妇之夫啊。由于毛经常接见这些文工团的演员，这个女孩子回来跟他哭诉，于新野一下子感情变化了。本来他正在为空军党委扩大会给吴法宪写讲话稿，突然躺下不干了。副参谋长王飞去催交稿，于对王飞说自己眼睛瞎了，不想干了。王飞说，什么瞎了？你不是好好的吗？于新野说，我看不清了，看不清伟大领袖了。参谋长了解于“罢工”的原由后，把情况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光火了，说于是在造谣，侮辱伟大领袖，要把于抓来枪毙。王飞打圆场说，不能让他乱嚷嚷扩大影响了，多做思想工作。

吴法宪比谁都明白，空军文工团经常派人“出差”去中南海伴舞，他当然不会处理于新野的，王飞也没揪于新野有妇之夫的过错，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于新野心底却埋下了一颗爱恨情仇的种子。

从此以后，于新野从无限的尊崇变成无限的憎恨。我认为“九·一三事件”，于新野起了推手作用。

◇ 林彪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没有想过去苏联

刘家驹：下面谈谈“九·一三”事件。九·一三的直接起因就是9月5号晚上由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南巡的两次讲话传给了于新野，于新野和周宇驰送到北戴河给林彪、叶群。

6号晚上，住在林彪卧室外间的的卫生员小陈听到他俩口子说话，叶群想走，动员林彪去苏联当寓公，林彪说，要走你走，我起码还是民族主义者。后来我考证这些话是否真实。我调查所有跟小陈有接触的工作人员都说他天真、单纯、不说假话。

9月7号，叶群把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一起叫到北戴河。姐弟俩有三次对话。对话很长，我采访过豆豆，留有记录。

林豆豆说：“……到了56号楼，我放下行装，到57号楼去见林立果，（原是张学良公馆）。我们两个楼之间也只隔了一条马路。我一进客厅，空军司令部的秘书刘沛丰跟我打了一个招呼就走开了。林立果坐在沙发上，他身边是周宇驰。我在空军经常见到周，但很少说话。我打量他的表情很木然，好像心事重重。

“豆豆，我有事找你谈。”老虎（林立果小名）语气沉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叫我一声姐姐，当部长以后，父母在他眼里也变了样，觉得叶群是个能人，林彪是个半残废，但是他对我却很尊重。“你知不知道叫你到北戴河怎么回事？”

“不是主任（叶群）说爸爸要见小张吗？”

老虎说：“打电话是我的主意，让主任把你骗来的。”老虎说话很直率。老虎接着说：“毛现在在南方背着总理、中央到处打招呼，他要搞掉黄吴李邱，毛还批了夫人专政，下一步就轮到爸爸头上了，我这里有毛的讲话记录，一会儿您看看。”老虎把一摞稿子递给豆豆。

豆豆翻了几下，说：“我不看。”

老虎说：“那我就先跟你讲讲。黄吴李邱听到毛的讲话，吓坏了，这帮人难有作为。爸爸也知道了消息，也不想活了，主任吓得哭，她想跑到苏联去，让我调飞机，我现在瞒着吴法宪把飞机调来了。我想知道您的态度，您能不能跟我一块走？”

我听了惊愕不已：“到底出了什么事，又不了解情况，我怎么能回答你？”

老虎说：“回头您好好看看毛的南方讲话，毛把我们逼上梁山了。要么出走，要么坐以待毙。现在我问您，如果我们走，您走不走？”

我被老虎突如其来的危言震住了，感觉眼前的弟弟不是弟弟，是一只拦路虎。我又望了望他身边的周宇驰，板着脸，腰里别着枪。

至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的地位处在风雨飘摇中，老虎眼前要破釜沉舟，是出于他的怨恨或只是在口头上说说？一种惊恐的疑虑陡然在我心里搅动。

林立果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都是在毛的步步紧逼下整垮的，爸爸的身体很弱，关起来没人照顾，不用几个月就完蛋了。我考虑把爸爸救出去，空军还有一定力量。这次不就把飞机弄出来了吗？”

老虎的话让我万分震惊，我相信他的胆量，不相信他的能量，我感觉他在逼我表态。我要不说，很可能后果难测，我知道老虎已非昔日，现在是只真老虎。我只好说：“走。”

我认为毛要动手不会这么紧迫，历来他要剪除一个党的领导者，总是要事先发动一群人。我又感到林立果在显示自己，认为林、叶在生死关头无能为力，只能听他指挥。

我告诉老虎：“我刚下飞机就遇到这么大的事，脑子都转不过来。”

林立果说：“过去我们两个是同盟军，现在关键时候了，你要出来说话，要联合，怎么行动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连小张（张清林，林豆豆丈夫）也不要讲。飞机是留下或是今晚走，你看怎么办？”

豆豆说：“我不同意今晚走。你先把飞机放回去，到底怎么回事，我还要了解情况。”

这时候李文普来电话，让他们上去见林彪。老虎说：“好吧，那我们下午再谈。”

回到驻地，已经是下午了，老虎又迫不及待把我带到57号楼，我一进客厅，周宇驰已经先到了。老虎坐下来先讲了一通国内外的形势，又讲了几个野战军是他的团结力量、依靠对象。说汪东兴是他的内线，还把毛泽东南方讲话进行了分析，老虎特意强调毛的那句话：“我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老虎接着说：“毛这次南巡回京以后，要对爸爸下手了。现在我们是鱼死网破的时候了。”

老虎有一腔怒火，但应对办法不多。我坚持要他先把飞机放回去，等我了解了情况再说。老虎同意明天再谈。

第二天傍晚，林立果来到我住的56号楼，一进门就说：“飞机放走了，我们不走了。”

我感到宽慰。还是很想知道爸爸看了南巡讲话有什么想法。我急切的问：“爸爸对南巡讲话有什么表示。”

老虎不说，又告诉我：“我又想到一个办法，搞政变。”“政变，政变怎么搞法？”我问。

老虎说：“我们有‘五七一工程’，以主席的名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毛家湾开，把江青、张春桥找来，来一个抓一个，采取逼宫，让毛主席表态。”

我再问：“汪东兴什么态度？”

老虎答：“汪东兴是我们的人，做内线，主席不从，就只好采取暗杀办法了。”

我又问：“谁敢下手？”

老虎说：“江腾蛟。这个办法还是他提出来的。”

我问：“江为什么这样做？”

老虎答：“江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他恨主席。文革中他要支持反许（世友）的那一派，后来主席做了好人，又把江当了替罪羊。江反对毛的腐化，最记恨毛在全国选妃，糟蹋了我党。”

我再问：“他怎么接近主席？”

老虎说：“他用自己的身份可以进到主席的警卫圈，待主席经过上海、杭州就可以动手，那里是他的地盘。”

我问：“警卫部队能放他进去吗？”

老虎答：“汪是内线，要是汪不听，我们可以把汪干掉。暗杀不成功，政变就搞不成功，我可以用林的命令把黄吴李邱骗去，我还掌握了汕头的55军和保定的38军，政变不成功，我们就飞往香港或者逃往苏联。”

我问：“去香港爸爸愿意？”

老虎说：“你放心，我们已经预演过。”



所谓预演，是去年林上井冈山故地重游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想让林去南昌看看。叶知道，自程世清主政江西，一直宣传林与毛会师井冈山。叶怕招风，飞机上了天，叶硬让驾驶员飞回北京。老虎从中得到启示。

“爸爸到底什么态度？”我盯住老虎要探明究竟。

林立果只说：“主任说全靠我们了，我过去空军掌握一些力量，关键环节主任不知道。我现在告诉她，她要依靠我，我也依靠她。”

我说：“我有第三条道路。朱老总头两天我还看到在北戴河，他现在是甩手掌柜。爸爸有病，他可以什么都不管。”

这条路当然好走，毛不会叫爸爸走。”老虎说。

“爸爸不是真正掌兵权的，你的先发制人又没有多大把握。”我软下来规劝老虎，“你还是个孩子，人家听你的？就算搞成功了，周宇驰年纪比你大，再来争夺你怎么办？我的意见不要这么急，现在北京什么情况你都搞不清。我我的看法是，在十·一前双方都不是动手时机，按照惯例，十一爸爸还要和毛在天安门亮相。”

老虎也陡然转了弯了：“我现在就上北京了解情况，我们是同盟军，听您的，十·一后再说。”

老虎走了，他一人驾上佛尔加去了机场。

主持人：这是他们姐弟两个人的对话？

刘家驹：这就林豆豆、林立果姐弟两的对话。我为什么选择姐弟俩的对话说事，它的真实性是专案组肯定的。我们从中可看到林立果焦急的为老爸的存亡寻求出路，他的想像不是空穴来风，半年前他们在上海制定的《571工程纪要》时就议过。他还是接受了姐姐“缓动”的主张，可他一回到北京为什么就变了？他派出于新野去上海杭州告之空四军空五军的领导，毛很快就要到了，要求他们不要轻信毛的“打招呼”，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8号中午，于在上海见了王维国，晚上到杭州见了陈励耘。于没想到毛3号就到了杭州，一到就召来陈励耘、南萍等驻军领导，又大讲他对庐山会议的种种不满，还点了林的名，汪东兴第二天就给驻抗的陆海空三军师以干部传达毛的南巡讲话。于认定，毛正紧鼓密锣的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造势，收拾林升级了。8号的晚上，于新野就把收集的情报传给了刚从北戴河回到毛家湾的林立果。于竭力地向林立果强调，毛从沪杭回京的路上，必须用“大铁锥”的手段先下手，机不可失。林立果本来是回京观望的，听了于新野的汇报，急不可待的和周宇驰一起去到西郊机场，召开了几个人参加的行动会议，部署江腾蛟为前敌总指挥。这样纸上谈兵的会，五天开了六次，设想的暗杀手段就有五、六条。多数人都是在会上凑热闹，真心实意要干的只有周宇驰于新野。林立果不光是开会说，还有行动，他带王飞到钓鱼台踩点，要王飞带领空军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不知兵不知战的林立果，还在现场指指点点的给王飞部署攻击路线和火力点的设置。王飞确实可以动用警卫营，只要他向干部战士宣布是去抓张春桥，都会奋勇当先的。拿下钓鱼台是可能的，王飞更知道，北京周边驻有66、38、27、28、63、69、65七个野战军，只需半天时间他们就会兴师勤王，即使你十个警卫营也会灰飞烟灭。王飞只能应付林立果，规劝他不能动武。林立果又把关光烈找来，关光烈虽已是43军军政治部主任，也调不了兵。林立果已决心“鱼死网破”了，谁也阻止不了他的铤而走险。

◇ 飞机毁于油箱爆炸，不是被击落的

刘家驹：我最后讲讲飞机情况，飞机0点32起飞，飞到迁安上空，转向340度，飞行高度600米，航速是550到600公里，飞的是之字形，在出境时飞机飞上升到3千，飞机出境后又进入低空，很快又下降到2千8、2千6，5分钟后目标在荧光屏上消失。为什么这么详细？空军雷达部长给我划了一张256飞机的航行图。这是他研制的541雷达获得的记录。很多人传言说，到了苏联边境又回来，没这么回事。因为北京到温都尔汗只有1100公里，2小时的时间刚好飞到温都尔汗。

飞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我认为有，很多人跟我有争论，说那时候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还没有搞黑匣子。但是接这架飞机的人跟我谈过，肯定有，录音的、录机械的都有。录音很原始，是钢丝的，只能录半个小时。

我们认为飞机是迫降的，不是打下来的，有人从现场的尸体上看到，大都脱下了手表和鞋，这是紧急迫降必要的准备。飞机要是导弹打的，就会在空中解体。现在地面上的飞机残骸横宽60米，纵深300米，肯定是着地时油箱爆炸了。

前些年我从一位知情那里了解到，九具尸体都火化了，虽然蒙古人没有火化的习惯，后来还把火化的骨灰埋在坠机现场，垒了一个大土堆。多年来不断有人去凭悼、扫墓，多是林的老部下。叶群和林彪的头颅都在莫斯科。有个英国作家找我，我说你有条件，能不能找克格勃问问黑匣子的情况，她去了，俄罗斯一个上校接待她，拒绝回答黑匣子的事。

□ 摘自《共识网》

~~~~~

## 【百家争鸣】

逮捕“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生前部署吗？

• 章立凡 •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剧中“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于1976年10月6日被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开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说：“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

这句台词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抓捕“四人帮”发生于毛泽东去世之后，由华国锋主导，剧中说法被指有违史实。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在新华网回应称，剧本之所以写出“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1975年5月，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因而龙平平认为华国锋在当时场合下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

据龙平平介绍，之所以把这个编剧任务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因为第三编研部职能就是“编辑邓小平同志著作，撰写其年谱传记，研究其思想生平”的，他本人已研究邓小平同志30多年。第三编研部过去就叫“邓小平研究组”，现在有不到20人，都是“拿工资专门研究邓小平”的职业研究者。邓小平文选、著作等都出自该部门，过去反映邓小平的影视作品也大多由该部门参与创作。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当作“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打倒。197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邓复出并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执掌党政军大权，成了“四人帮”的主要政治对手。1976年春，他再度被毛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四人帮”垮台后，邓再度复出推动改革开放，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逮捕“四人帮”事件，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历史不容戏说，毛泽东生前究竟有没有布置这场“捉妻大戏”？不可不详加辨正。

#### ◇ “反经验主义”的两桩党史公案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台词所依据的“红头文件”，是《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查阅原件，内容为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下发时间为1976年10月18日，距逮捕四人帮仅12天。文件罗列了1974年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其中龙平平所引用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句话，出自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谈话，但这句话的前面，还有毛泽东在同一场合的不少谈话内容：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上述谈话内容，后来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其中提及的“反经验主义”源于中共党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是这次谈话的重要背景。

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追述：“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又称‘九篇文章’）。”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高层受到严厉批判斗争。据胡乔木记述：“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博览》杂志的《“四人帮”批“经验主义”始末》一文，1975年3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同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高层权力斗争热点转移。从批外交部“投降主义”到“批林批孔”夹带“批周公”、“批走后门”，周恩来压力逐渐增大，工作中一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文革派”的攻击。邓小平1973年复出后，开始分担周的工作。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在各个领域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江青等“文革派”摩擦不断。

江青、张春桥等在毛的支持下批判“经验主义”，斗争矛头直指周恩来，也与邓小平主持下

的全面整顿工作发生了冲突。

◇ 毛泽东谈话的主旨是平衡高层矛盾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向毛反映江青等大批“经验主义”的情况，邓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为了平衡矛盾，表示同意他的意见。4月23日，毛在姚文元转呈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根据毛泽东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言论，并对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江青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其他宗派活动，提出了尖锐质问，江青被迫检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致信毛泽东：“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打电话向毛告状，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据她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5月1日发表文章，改称要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75年5月3日深夜，政治局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开会。会议记录全文至今尚未公开，关于毛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披露了比1976年“红头文件”更多的内容：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下写出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没有说教条主义。”

“其他的事情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

大家再议一下。”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另据上述《党史博览》杂志文章，毛还有如下说法：“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纵观毛泽东上述发言，首先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承认自己失察，分担了反“经验主义”的责任；其次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各打五十大板——“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三是提出解决办法：“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四是定性：“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最点穴一句话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毛泽东举重若轻，将江青“个人自作主张”引发的各种事端，圈定在“我看问题不大”的党内违纪范畴；至于“不要小题大做”，当然是在讽示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适可而止；所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实就是问题“讲明白”之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 ◇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晚年与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一生善于利用矛盾，在党内始终居于最高精神领袖和仲裁者的地位。晚年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后，渐感力不从心，却不得不将这种角色扮演下去。他被迫品尝自制的苦果：在两套接班人体制上作艰难的选择。一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领导层，致力于现代化经济建设，但不大理会毛的乌托邦思想；另一派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坚持毛式乌托邦主义，但无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检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自1973年11月至1976年3月，有关江青的信件、批语和谈话共计20处（另有3处对文艺工作的非点名批评未计在内）。其中收入《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的八处，收入《给江青的信和批语》的八处，收入其他篇目的四处。这20处评语中，以书信和批语私下劝诫、抚慰的11处（其中四处有阻止江青探望自己的内容），用谈话、文件批示等方式的批评九处。该书的“出版说明”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而上述内容中，至少有三处毛与表侄孙女王海容、时任英文翻译的唐闻生的谈话片断，出自毛逝世后王、唐二人的揭发材料；这些文字被正式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显然不当，仅可作为史料参考。

自江青被毛泽东推上政治舞台，上升为权势逼人的“文化革命旗手”，两人逐渐由革命伴侣

演化为“政治夫妻”，一位宅居中南海，一个长住钓鱼台，平时难得见面。林彪事件后，江青的势力和野心膨胀，常常以毛的名义发号施令，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臣争夺权力，不时给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添乱，令毛不耐烦，每每予以训诫。

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不同场合有不同语境。在政治局会议场合，持论冠冕堂皇：“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在与王海容、唐闻生两位晚辈女孩背后议论时，毛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揭发说：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而在尔汝私语的夫妻书信中，毛心情复杂，既怨且忧：“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不胜聒噪，屡屡拒见江青，虽是万般无奈，犹存夫妻恩义。他深知江青在政治上远非他人对手，担心身后有变，为老妻苦心谋画保全之道。在来信批语中指点迷津，苦口婆心谆谆告诫：“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务请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圣心难测，天心难测，毛泽东最担心的事，就是身后被人“鞭尸”，否定平生帝业。他虚与委蛇地放话“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之后，形势发生一连串戏剧性变化。

1975年下半年，毛先后发动了“批《水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1976年，上半年周恩来逝世，天安门爆发“四五运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被打倒，华国锋接掌权力；下半年唐山地震，毛泽东撒手人寰，江青及其盟友成为阶下囚。造化弄人，十年“文革”以宫廷政变始，以宫廷政变终，恐怕也是体制的历史宿命。

38年过去，真实的历史依然朦胧破碎。当年“红头文件”节录的毛泽东发言，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演绎成毛将整体解决“四人帮”，或许是危情之下的“矫诏”。如今坐拥查阅大内秘档之便的专家总编剧，又将这句话进一步放大，“创作”出毛泽东“生前部署”捉拿妻党的台词，就太没有逻辑了。

我十分同情总编剧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须“符合人物、历史环境和当时的场景”的主张。主创人员的困境在于：主旋律脚本创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切割“文革”发动者与“四人帮”的关系，恐怕也是“政治任务”的一部分。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穿越”手艺，果真是中央文

献研究室的学术水准？

传说中“历史虚无主义”，终于被我发现了……

本文部分史料参考了《毛泽东传（1949—1976）》（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8.24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 /

---